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2.025

## ■ 文史研究

#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与分裂<sup>①</sup>

——以 20 世纪初期的媒介实践为例

汤林峰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要:**20 世纪以来,媒介的兴起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接受这一新事物,并通过媒介实践,开始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对待媒体态度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了分裂。究其原因,学校与文凭造就了知识分子的等级制度,促使了知识阶层金字塔结构体系的诞生,导致了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媒介实践中的差异性。

**关键词:**知识分子;媒介;胡适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2-0145-06

##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lf - construction and Split: A Case Study of the Media Practice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TANG Lin - yi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media ha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intellectuals, who accepted it quickly, and started to shift into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edia.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ir practice, the intellectual group split into several schools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background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media. The reason for that was because of the hierarchy system, caused by the college and the diploma, promoted the birth of the pyramid system of intellectual class, thus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 practice by intellectuals from different classes.

**Key words:** intellectual; media; Hu Shi

20 世纪初期兴起的大众文化,引起了知识分子的高度关切,其中质疑者居多。法兰克福学派就认为,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使 20 世纪的文明水平降低,媒体导致人们精神生活不复存在。特别是报纸的诞生让知识分子感到难受,它造就了一种面向大众的全新文化形式,这种形式忽视了文化精英,使知识

① 收稿日期:2013-04-19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1YBA290);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2C0422)

作者简介:汤林峰(1981-),男,湖南湘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新闻学、文学理论研究。

分子成为了“多余人”。报纸以销量为主要的评估标准,重视受众的需要,在德弗勒的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中,将受众分为高等文化修养的人、中等文化素养的人和缺乏文化素养的人,其中缺乏文化素养的人是受众的基石<sup>[1]14</sup>。这导致欧洲的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发展初期,普遍对其持敌视态度,尼采提出,“贱民吐出的怒气,称之为报纸,我们蔑视所有与读报,更不要说为报纸撰文之类相一致的文化。”T·S·艾略特在审视大众报纸带给读者的效果时,也用上“确认他们是自满、偏狭和没有头脑的大众”的评语<sup>[2]8</sup>。

这种来自知识分子的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生转变,媒介与知识分子之间不再是尖锐对立,而是开始合作,这也和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有关,萨义德在论及知识分子时曾言,“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sup>[3]16-17</sup>在这里,媒介成为了传播思想与言论的渠道,让身为传播者的知识分子拥有比学校和研究机构更广阔的受众群体。

## 一 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及其有机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报刊开始引入中国,并在20世纪初期得到了迅猛发展。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批判所不同,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接受这一新事物,甚至不少报刊本身就是由知识分子创办。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似乎具有天然亲近性,他们意识到报刊将成为其发挥影响力的新平台;是杜绝知识分子游离于社会之外,导致自我边缘化的手段。从梁启超、谭嗣同到胡适都注意到了媒体的渠道作用,梁启超将报馆视为开发民智与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胡适创办了多份刊物,与《大公报》等当时社会的主流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新式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sup>[4]9</sup>

首先,传统知识分子通过媒介实践,开始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葛兰西对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了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两大类型。传统的知识分子如老师、教士,世代从事相同工作;有机的知识分子与阶级、企业密切相关,成为获取利益、控制权力的工具。在葛兰西眼中,20世纪传统的知识分子停滞不前,而有机的知识分子则不断壮大。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还秉持传统,大多以教育家及学者的身份行走于世,但也显示出有机知识分子的烙印,胡适那句“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至少体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合作关系。“权势集团所具有的腐蚀性,即便落在以‘独立’自诩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不能避免……既已加入政府,或既已与权势集团有了紧密的联系,那么在意气上和人情上,也不好公开和政府对抗。”<sup>[5]358</sup>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国政府,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与各个阶级、团体和政党有着密切联系,如“左联”与《申报·自由谈》之间,其主要作者群体43人中有22人是“左联”成员,政治色彩更为浓厚。

其次,精英知识分子通过媒介实践,完成了学者向政客的转型。1928年,《大公报·文学副刊》在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介绍法国学者班达。班达谈到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其中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是关键因素,“班达写作的年代是1927年,远在大众媒体时代之前,但是他意识到对政府而言把那些知识分子充作仆役是多么重要的事:把知识分子召来不是为了领导大众,而是为了巩固政府的政策,发布文宣来打击官方的敌人,制造委婉圆滑的用语,而且更大规模地设立类似奥威尔式的新语那样的种种体系,以体制的‘权宜措施’或‘国家荣誉’之名来掩盖真相。”<sup>[3]13-14</sup>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对参与政治的渴望,与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需求是相互的,两者之间具有双向性,而媒体则成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结合的管道。以《大公报·星期论文》为例,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登启事,邀请社外名家撰写社论,定名为《星期论文》,先期共有8人: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

振声和蒋廷黻。其中,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等相继进入政府(见表 1)。

表 1 《星期论文》早期撰稿人的职业、政府职务

姓名	职业	政府职务	发表篇数
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	驻美大使	25
陈振先		四川行营第二厅厅长	4
傅斯年	北京大学教授	国民参政会参议院	23
丁文江	北京大学教授	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9
蒋廷黻	清华大学教授	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7
杨振声	山东大学校长	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7
翁文灏	清华大学教授	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	1
梁漱溟	北京大学教授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4

媒体成为了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跳板。民国时期的政治权利大多掌握在军人和职业政客手中,这些不具备较强专业行政能力的官员,对政府的执政起到了负面作用,而知识分子基于传统“士大夫情怀”,政治人物的知遇之恩以及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等诸多因素,接受政府公职,成为技术官僚。这批拥有学术光环的知识分子在“入仕”前,心气非常高,而这种精英心态,在他们通过媒体发表的言论中表露无疑。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1923 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腐败和军阀专制,而是在于有知识、有道德的“少数人”不肯负责,不肯努力,“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sup>[6]31</sup>但是,丁文江在政治上的建树,远没有和其学术地位相匹配。与之类似的还有,胡适任驻美大使,翁文灏赴行政院,蒋廷黻任驻苏大使等,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汤尔和就曾向胡适直言“不要谈政治”,写时评是一回事,现实政治又是另一回事。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应该视媒体为舆论监督的渠道,而不是将媒体视为跨向政坛的工具和跳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对专业性的要求越来越细致,知识分子从政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以时评、社论等形式,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不失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之一。

## 二 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与自我分裂

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20 世纪初也同样是一个转型时期。随着媒体的兴起,受众群体的扩大,知识分子有了全新的言论空间,他们通过舆论来引导大众,进而影响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通过媒介实践,进一步加深了其群体内部之间的裂痕。知识分子的决裂,在各自的留学时期就有所体现:截止 1924 年,留美学生人数达到了 689 人,而留日学生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就远远超过万人。在人数上,留日派远大于留美派,其中留日的学生前期为推翻帝制作思想与人才储备,辛亥革命后又为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做准备。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日本思想界的左倾现象非常明显,“留日学生不同程度地由历史进化论者转变为革命进化论者,激进的、实践性的人才层出不穷。”<sup>[7]104</sup>而留美学生中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压力都明显小于留日学生,“喜好文科的便能直奔自己的文科专业,回国后大部分还都在大学教书、写作,专注于输入西方的学术文化与思想,从事文科的反倒更多。”<sup>[7]107</sup>由此可见,由于目的不同,留日学生虽然人数众多,但并没有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就,反而造就了一批革命家;而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大多取得了硕士、博士文凭,构建了相对完备的知识体系。

这种差别,在留学生群体归国后的媒介实践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新青年》开启了一个时代,是知识分子借助媒介,占据时代舆论中心,引领社会潮流的典型。1919 年 12 月,《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提出:“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sup>[8]</sup>以胡适和陈独秀为

各自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新青年》上彻底分化。其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见表2),撰稿人大都以留学欧美的同人为主,而陈独秀以及之后的“左联”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表2 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与教育背景

刊物	留学日本	留学欧美	国内
新青年	15	4	1
星期论文		30	7
自由谈	15	5	22
独立评论		26	4

一方面,教育背景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志趣上产生了区别,最终引起其内在分裂。究其原因,一是现代教育成本的上升,导致学术圈出现贵族化、门第化倾向。能够支撑留学欧美的大都出自殷实家庭,而留学日本相对花费较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两个群体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二是欧美和日本所接触的不同思潮,也导致了知识分子日后思想上的差异性。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这就是后来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的由来,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胡适、吴宓等就是通过这一渠道出国留学。这些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以欧美相对成熟的社会结构映照中国现实,导致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法结合中国底层社会的实际状况,“一般留法留美留英的博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空口讲改革,没有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做工作,所以终于找不着实际问题。”<sup>[9]536</sup>

另一方面,对待媒体的态度上,知识分子之间也产生了分裂。第一种以众多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将重心完全转移到了政治运动之中,媒体成为宣传革命文学与思潮的阵地;第二种是热衷于通过媒介发表“政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将太多精力投入到议政之中,进而影响到自身的学术研究,胡适就得到“半部书先生”的雅号;第三种是恪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媒体成为他们教化大众与阐述专业知识的载体工具。这种恪守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类似于班达所下的定义,他们具有几个重要特征:具有使命感,具有象征性,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数必然不多<sup>[10]</sup>。进入20世纪以后,这些知识分子不再面向公众,而是根据专业演化出一种批评话语文化(萨义德语),供相同领域的成员共同使用,这种专家之间的共同语言,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吴宓就是这种专业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媒体则成为这些具备相同批评话语文化的知识分子公开交流的工具。

对于报刊的影响力,吴宓在留学美国之前就有所考量,办报也是其理想之一。1915年10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杂志一途,则近二三年来之趋向,余生好文学,不厌深思远虑,而以修养之结果,期于道德之根抵完全。于风潮之来,可立当其而不移,遇事有正当之判决。社会之恶习,见之多而感之深,故治杂志业,则有以下之利益:(一)旁征博览,学问必可有成。(二)殚力著述,文字上必可立名。(三)针贬社会。(四)发扬国粹。(五)游美归后,尚可日日修学,日日练习观察,治事之像,兼有进境。”<sup>[11]509</sup>留学美国后,吴宓留心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看到了报业与文学相结合后所能产生的巨大威力,1919年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偏感,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貽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芳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sup>[12]90-91</sup>回国初期,吴宓将自身的报业理想与学术生涯相结合是在《学衡》,1921年,吴宓“为了和梅光迪相聚南京东南大学,为理想中的西洋文学系和筹办中的《学衡》杂志,吴宓放弃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学校的聘请,到了南京。”<sup>[13]238</sup>

1922年1月,《学衡》创刊,期间吴宓苦苦支撑,而《学衡》同人却不太热心,“有段时间,连《学衡》的开创元老柳诒徵也要把正在刊登的《中国文化史》抽下,梅光迪甩手不管,吴宓求救于陈寅恪,陈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应停办。”<sup>[14]</sup><sup>145</sup>媒介的影响力取决于诸多要素,其中受众是一项重要指标,它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传播活动的重要环节。由于《学衡》致力于专业领域,强调同领域的共同语言,导致受众成分单一,数量稀少。这也是陈寅恪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的由来。1925年,吴宓赴清华任教,开始筹备《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正式刊发。吴宓与《大公报》的合作,首要原因就是看中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受众数量巨大,这也和《学衡》所带来的教训有关。

### 三 知识分子热衷于媒体的内在动因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热衷于媒介实践,由多方面原因构成。由于以学校和文凭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文化权力等级制度,以及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等原因,促使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寻找更广泛的言论空间。因此,知识分子青睐媒体,媒介实践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潮流。这种现象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以及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金字塔结构的文凭等级制度,压缩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寻找新的领域。现代社会中,以门阀和科举制度构建的文化权力等级制度业已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凭和知识背景为核心的体系。“1920~1930年间,一个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欧美留学生处于金字塔尖,留日学生其次。”<sup>[4]</sup><sup>12</sup>相对而言,媒体是受现代学统等级制度影响较小的领域,处于文凭社会金字塔底端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中也能获取自身的空间,并影响到舆论的走向。以“左联”为例,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其中成员的学历主要由两种构成:留学日本和国内师范院校。“左联”成员毕业或肄业后,几乎没有人留在国内高校任教,按照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他们大都脱离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处于现代学统等级制度的底端,而为报刊撰文,在给他们提供言论空间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

第二,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开始寻找一个沟通学界与政界的渠道,媒体成为了其首要选择。“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sup>[14]</sup><sup>1</sup>在这三种模式中,知识分子选择成为政府官员以及组织政党相对较少,当时大多数学者通过“议政”来参与现实政治。究其原因,其一是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崩坏,而民国时期推荐官员的举荐制度又带有不确定性,导致了知识阶层与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稳定的人才输送渠道。二是从传统的清议,到近代舆论的诞生,都以公开评议政治为己任,强调构建一种有别于官方言论的民间话语体系。三是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意识。胡适在1933年回信汪精卫时曾言:“我仔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面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又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绝不是图一点虚名,也绝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在紧要的关头,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sup>[15]</sup><sup>174</sup>胡适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而现代报业的发展也给知识分子充当“独立政论家”提供了条件,给他们带来了更广阔地言论空间。“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所提供的话题空间,远非传统士人所能想象。此外,相对于儒家经典的受众面而言,报刊的读者面要广泛得多。”<sup>[16]</sup><sup>40</sup>

第三,在知识分子眼中,媒体能扩大自身影响力,带来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这一点单纯的学术研究做不到。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谈道,“《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的商人。其后几年,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sup>[17]</sup><sup>146</sup>随着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媒体开始占据社会体系的中心位置,促使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sup>[18]</sup>。这一点才是打动知识分子,使之放下身段与媒体合作的深层原因。首

先,精英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打破知识界与政治权力之间的隔膜,拉近其与统治阶层的距离,“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sup>[17]151</sup>其次,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媒体重新获取了分享权力的渠道。茅盾为《申报·自由谈》供稿,一方面是因为其与主编黎烈文之间的交情;另一方面也是看重《申报》的影响力,在《申报》上拥有一席之地,对左翼作家而言是一个胜利<sup>[19]230</sup>。最后,传统知识分子利用媒体传播学术理念,将媒体视为教室与研究机构的延伸平台。比如,吴宓先后创办《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就是如此。

### 参考文献:

- [1] 段鹏. 传播学基础: 历史、框架与外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 [2] 约翰·凯里. 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M]. 吴庆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3]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4] 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5] 章 清. “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6] 王仰之. 丁文江年谱[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 [7]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8] 本志宣言.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N]. 1919.
- [9] 晏阳初.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 [10] 本 达. 知识分子的背叛[M]. 孙传钊,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11] 吴 宓. 吴宓日记(第一册)[M]. 吴学昭整理注释.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2] 吴 宓. 吴宓日记(第二册)[M]. 吴学昭整理注释.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3] 沈卫威. 回眸“学衡派”[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14] 《书屋》编辑部.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游走[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 [15] 耿云志. 胡适年谱[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
- [16] 唐小兵.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17] 蒋廷黻. 蒋廷黻回忆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 [18] 周德义. 媒介越位: 权力的扩张, 还是监管的缺失[J]. 湖南大学学报, 2012(3): 112-116.
- [19] 邵伯周. 茅盾传[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责任校对 龙四清)